

守护

上海之心

■ 南京东路街道承兴里的弄堂里竖起了隔离栏,确保阴性居民和涉阳居民无接触



(上接第4版)

市委工作组进驻黄浦区后,发现区里有一个“三对三”的包保机制——三位区领导牵头负责三个重点街道的疫情防控工作。但哪位领导对应哪个街道,并未明确。工作组提出,既然是包保,那就应该一对一,签下军令状,聚焦重点,压实责任。此后每位领导明确了包保对象,“自家的孩子自家抱”,每位领导的工作责任感和推进力度明显加强了。

当时部分街道同样存在类似职责不明的问题。在与一个街道班子成员交流时,下沉工作小组组长直接问书记和主任,你们分别包保哪个居委?组长又问一位副主任,你包保的居委昨天核酸筛查情况怎么样?对方拿出手机要查。组长说,不用看手机,直接说……当天街道领导班子立即调整了包保对象,主要领导带头“啃硬骨头”。第二天开始,各班子成员便每天出现在社区里。组长说,不是说干部工作不努力,他们有很多组织协调的工作。但特殊时期,领导干部就要到一线解决问题,这是首要任务。

市委工作组着力推进的一项工作被基层干部称为“及时雨”,那就是打通疫情防控相关数据、信息的“最后一公里”。街道、居委一度不知道本区域的大筛结果怎么样;不知道区里当前的运力有多少,方舱、酒店资源怎么样;不知道接下来的转运计划是什么;不知下一批保供物资什么时候到;甚至不能及时掌握市里最新的防疫手势和工作规范。因此他们无法胸有成竹,或者至少有理有据地去说服打电话甚至冲到居委会来质疑的居民。他们只是被动的执行者,通知20分钟后大巴到,就赶紧去动员待转运居民,哪怕是凌晨;半夜接到通知第二天清晨6时全员核酸检测,就匆匆去发公告,召唤志愿者。在市委工作组的建议下,从区到街道,从街道到居委会,关于疫情防控的最新数据和信息,迅速下达到居委会一级。由此街道和居委会的抗疫局面为之一变:从处处“被动挨打”,到提前研判,根据区里的资源数量和行动计划,结合自己的区域情况,提出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案。而自从诉求得到重视,信息变得透明,基层一线防疫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创造性、执行力被极大激发出来,与居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大大减少。

除了对工作机制的检查和督导,市委工作组主要的督促指导工作是在防控一线的现场。五里桥丽园居民区,5月4日出现13例阳性感染者,疫情出现反复。市委工作组干部姚喜荣下沉当天一进小区就皱眉头:垃圾散落一地,这样的脏乱环境怎么能做好消杀?居民跑进跑出晾衣服,足不出户的要求在哪里?他把丽园居民区书记张曼静带到现场,一一指给她看:“今天一定要想清楚怎么把这些问题解决了。”

面对批评,张曼静心服口服:工作实在太忙了,有些问题确实疏忽了。

令张曼静印象特别深的是,当时小区有一位居民核酸检测CT值是12,意味着具有极强的传染性。该居民的楼上同一室号已经感染。与此同时,现场流调发现,加装电梯挖断了污水管道,留下的水坑可能存在隐患。在市委工作组下沉干部的大力支持下,阳性居民所在的楼栋36户人家,35户全部拔点转移,同时抽干水坑全面消杀,从此丽园小区疫情断崖式下跌。

采访当天在丽园小区行走,可以感觉到社区管理得井然有序,张曼静也从容自信。市委工作组下沉五里桥街道干部曹波说,我们刚来时她都不怎么说话,闷闷的,现在像换了个人。我当时告诉她,我们不是来盯着你的,是帮助你们解决问题的。

5月27日,记者随市委工作组下沉干部刘刚、罗才林一起走进黄浦区253弄承兴里。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很难想象在南京东路街道,还有居住条件如此恶劣的地方。

双手并用紧抓着扶手,慢慢攀上狭窄陡峭的木楼梯,昏暗的走廊尽头,是一间只有6平方米的小屋。70岁的陆老伯和老伴在这里住了几十年,最难熬的就是最近两个多月的时光。“家里实在太小了,关在里面,就像在坐牢。”

这是典型的二级以下旧里。房屋逼仄,人员密集,很多人家的居住面积只有个位数,加上建筑以木结构为主,煤卫合用,门户相连,很难阻断病毒的传播。疫情发生以来,住在这里的2980位居民,有1909人确诊,感染率接近65%!

“体力不支,方法穷尽,思路打不开。”刘刚回忆刚刚下沉时,听说承兴里的居委干部累到两个尿血,一个吐血,十分震惊。但现场看到的又是问题重重:核酸检测手势松,足不出户做不到,阳性病例转运慢,门岗守卫有漏洞……

“基层的确已经干得很辛苦了。但这是一场必须赢的战斗,打仗肯定有付出、有牺牲,不管怎样我们和基层干部共同面对。”市委工作组下沉南京东路街道和外滩街道小组组长苏国林告诉记者。纪检监察干部到一线和一般的工作组不一样,首要的任务是把黄浦区干部的思想统一到抗疫的总方针上来,不动摇,不犹豫。

“承兴里三分之二阳了,这样严峻的形势考验着一线,也考验着我们的下沉干部。我们绝不能躺平,而是通过比别人加倍甚至几倍的努力,不放弃一个人,这才是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这才是以人民为中心。”在苏国林看来,光发现问题远远不够,关键是要解决问题。市委工作组下沉干部们除了每天早晚两次碰头谋划如何解决具体问题,剩下的时间全都扑在一线,和社区干部并肩作战。

做好拔点清运的同时,罗才林督促居委抽调志愿者和特保人员,组建消杀专班,加大对小区垃圾桶、倒粪站、过道等公共部位的消杀频次和力度。为鼓励大家做核酸,每次做完核酸,居民都能领到一个N95口罩,不仅提高了大家的积极性,也让很多原本心疼钱、普通口罩也舍不得戴的人有了更好的防护。承兴里走廊狭长,车辆无法进入,大家就化整为零,用共享单车为居民运送物资,送药上门。

承兴里门前街道的上街沿,扎着一排帐篷,临时招募的特保人员就住在这里。“大家都很辛苦,

很多人每天只能在这里睡上一两个小时,剩下的时间都是在拼。有的人连续40多天没有洗过澡。”罗才林告诉记者,特保们很拼,但由于是临时招募,没时间培训,很多人都有这样那样的小毛病。

“比如戴口罩,很多人经常会疏忽大意,佩戴不规范,有的居委发生30多名特保被隔离的事件。”为此,罗才林还专门约谈了分管特保的街道下沉干部,要求严格落实特保人员每日核酸检测、防护装备穿戴等规定,并和街道分管领导一起走访寻找,妥善解决了特保人员的住所场地问题。

“各居民区都有包保的片长、街道干部,责任分解,落实到人,如果做不好,思想上有松懈,就要约谈。”刘刚说,工作组和基层干部每天都是并肩作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但该提醒的还是要提醒,立下了军令状,就必须要做到。

当然,市委工作组下沉干部也都有各自的煎熬时刻。拔点攻坚时,瞿溪新村居委有13个老阳一直滞留社区,大多是瘫痪在床的老人和残疾人,有各种疾病在身。鲍晨辉上门时,看到大家各有各的难处,于心不忍,一度有过动摇。但这些人居住条件都很差,加上每家都有保姆,老人可以不出门,保姆却要天天在公用区域烧菜做饭,这样一来,交叉感染的情况就会绵绵不绝。

转运那天凌晨,鲍晨辉在小区里转了很久,最终下定决心,人必须转到定点医院,但要做好“后半篇文章”,为每位老人找好保姆,解决好个性化需求。

“这场抗疫之战中,很多人都经历了这一辈子都没经历的磨难与考验。”鲍晨辉告诉记者,瞿溪新村的居委干部们都很拼,很多人40多天没有换过衣服,还穿着冬天的羽绒衫。“因为和老百姓感情深,大家很多时候抹不开面子,碰上事情犹豫不决,这在平时情有可原,但打仗的时候,必须听从指挥。”让他感动的是,所在居民区书记被免职后,并没有离岗,还是在一线为居民服务。

工作组在各个街道、居委促进解决问题的事例不胜枚举。如下沉打浦桥街道干部邓筱和胡懿然发现,街道和居委无法及时、准确了解居家隔离人员的进出情况。在毛莉组长带领下,下沉小组对全街道居家隔离人员门磁安装和使用情况开展了一次专项检查。调查发现,全街道居家隔离户数有500家,但实际仅98户装了可运行的门磁。造成这一现象,有三方面原因:一是货源数量少;二是容易损坏,背胶不牢;三是居委积极性不高,居民每次开门要在群里报备,太多了也管不过来。下沉小组认为安装并正确使用门磁对防控居家隔离人员传播风险很重要,为此写了专报,希望街道改进。街道党工委书记姜敏知悉后表示即知即改,很快为200户家庭加装了门磁,并安排定期检查。

在携手抗疫的过程中,市委工作组和黄浦区形成了一个良好的互动机制。每个工作小组(通常驻点两个街道)每天提交在巡查中发现的问题报告,有的以专报的形式提交。每晚8点市委工作组和区、街道负责人开视频例会,摆出问题,现场形成解决方案。同时,对前一天报告的问题落实情况讲评。这样一个压茬推进、即知即改的机制,为黄浦区的战疫行动提供了宝贵的“前敌情报”和先手出击的时机。

(下转第6版)

■ 下沉干部朱舜晔为居委的工作人员规范穿戴防护服

